



“洋人眼中的西藏”

译丛

德西迪利西藏纪行

Dexidili Xizang Jixing

王启龙/主编

[意] 依波利多·德西迪利/撰 菲利普·费立比/编 杨民/译



西藏人民出版社

“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

德西迪利西藏纪行

[意大利]依波利多·德西迪利 撰
菲 利 普 · 费 立 比 编
杨 民 译

西 藏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西迪利西藏纪行 / (意) 德西迪利著; (意) 费立比编; 杨民译.
-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2004. 5
(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 / 王启龙主编)
ISBN 7-223-01525-X

I. 德... II. ①德... ②费... ③杨... III. 西藏-地方史
- 史料-16 世纪 IV. K29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1328 号

德西迪利西藏纪行

De Xi Di Li Xi Zang Ji Xing

作 者	[意] 依波利多·德西迪利
译 者	杨 民
责任编辑	晋美旺扎
封面设计	萧 辉
出版发行	西藏人民出版社(拉萨市林廓北路23号)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15.7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1-3,000
书 号	ISBN 7-223-01525-X/K·39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总 序

王 尧

近代以来，“西藏热”一次又一次的升温。近几年来，西藏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其中炒得红红火火的尤其是出版界，各种与西藏有关的丛书纷纷问世出版并且广受欢迎。走进书店，你就会发现琳琅满目的关于西藏的图书：《走过西藏》、《风情西藏》、《西藏纪行》、《写真西藏》、《聆听西藏》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走近西藏丛书”和西藏人民出版社的“风马旗书系”等等。当然，还有许多藏学译著也在源源不断地在读者面前展现出来。其中有不少国际友人和学者严谨、公允的论著早已为国人熟知，比如美国学者梅·戈尔斯特的《喇嘛王国的覆灭》（杜永彬译，时事出版社 1994 年版）和加拿大学者谭·戈伦夫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伍昆明、王宝玉译，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等等。

不过，在藏学译著的出版中，对于那些“百年老书”的确出版甚少，应该引起重视。

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各路洋人就开始纷纷以各种方式叩动西藏的门扉、闯入西藏的土地，这些人无外乎如下三类：

第一类是游历者和探险家，这些人怀着所谓西方“文明人”的心态来到藏区探险、旅游，将他们的真实感受和亲眼所见的情形记录下来，这些记载无疑是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过去之真实面貌和实际情况的宝贵材料。但由于他们自视“高人一等”，在观察

视角和描述过程中难免带有帝国主义的偏见。有时这些文明人的行为是极不文明的。比如，正是他们首先拿起来复枪向珍稀动物扣动了罪恶的扳机。这大概是他们的那些如今高喊保护动物、保护环境口号的后裔们没有想到的。

第二类是那些科学考察工作者，他们出于这样那样的目的，来到环境极其艰苦的藏区进行所谓的科学考察，在动植物考察、地理勘探以及其他领域内确实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留下了一大批实地考察的记录材料。尽管他们考察的目的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是为各自主子的殖民主义政策的推行搭桥铺路而来，并不是因为他们大发善心而千里迢迢来为西藏人民服务。不过，他们留下的这些材料直到今天还是颇有参考价值的。我们“拿来”用用何尝不可？

第三类就是那些野心勃勃而又厚颜无耻的军人和政客们，他们践踏了你的土地，还要强词夺理：他们本是强盗却偏把自己粉饰成君子！读者不妨打开本丛书“雪域旧旅”译丛中的《青藏高原上狩猎与旅游》一书，看看当年率兵侵略我西藏地方的大名鼎鼎的荣赫鹏上校为此书原著所写的序言是如何下笔的吧：

战争完全是一种罪恶吗？武力的使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坏事吗？这是亨利海登爵士的这本书将会引起我们沉思的问题。距本世纪初二百多年以前，一个意大利人进入拉萨，这比英国人早了一百年，比法国人早了五十年。但在上个世纪（即19世纪——译者注）后半叶的整整50年间，进入拉萨这座庄严城市的通道完全封闭了。俄国人曾试图想进入，法国人也尝试过，英国人、瑞典人和美国人都试过，但均遭到西藏人的顽强抵制。

全世界任何有良知的人们读了这段话绝对不会不为之瞠目、为之愤慨！今天我们把它译出来，当然不是赞同他的观点，而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荣赫鹏之流的侵略者丑恶言行与肮脏嘴脸！对其遗留的思想遗毒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掉以轻心。

自从洋人染指西藏以来,在几百年中出自洋人手中的关于西藏的书籍可谓汗牛充栋。其中在 20 世纪初叶甚至于在 19 世纪以前出版的著作,即所谓的“百年老书”翻译出版的为数寥寥,即使有译本的也非常陈旧。而这些书籍有好些是值得介绍的,它们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在西方出版后曾引起西方人的极大兴趣。普通的读者是难以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的,只有专业人士在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东西而已。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只是从自身的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尽管他们的动机未必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因此,启龙同志利用工作之余,忙中偷闲,筛选部分精彩的百年老书而编成的这套译丛,由有关出版社推出,实在是一件大好事。

正如主编前言中所引冯友兰先生语:“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相信这套译丛的出版,不但会给普通读者提供更多的了解西藏的读物,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藏学研究的发展。

主 编 前 言

王启龙

我们知道,早在清朝末期,就有贵州学政赵惟熙、刑部侍郎李端棻、清末名流张百熙等人认识到,为了民族的复兴,文化艺术与科学技术方面的国际交流势在必行,故而应该设立译事机构、大力提倡译书。据冯友兰先生说,清朝译书大约三千余种。我想这与上述各位有识之士的大力提倡不无关系。到了民国时期,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冯友兰先生深感这方面的工作做得相当不够,于是又撰文呼吁:“我觉得现在中国所最需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译书。”为什么呢?因为文化的复兴、科学的发达需要交流,关闭的国门需要打开。“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要想叫中国学术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1]形象生动地点明了翻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时光荏苒,岁月如流。如今我们已经告别 20 世纪,刚刚跨进 21 世纪的门槛。中国已经是一个颇具国力而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当然,中国的学术在世界学术飞速发展的潮流中也在滚滚向前迈进,各个领域成就斐然。中国已经敞开胸怀接纳国外一切有用的先进的东西,中国已经阔步迈向世界!

但是,我们依然要说,翻译方面现有的进步还不够,现有的努力还不够。由于人们的精力有限,人们懂得的语言也有限,故而译

书至今相当必要。这方面在藏学界以及其他边疆研究方面更是如此。笔者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前人及同行们在这方面的累累硕果。

改革开放以来,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藏学界成果辉煌,其中包括藏学论著的翻译。比如 20 世纪 80 年代起由王尧先生主编、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套丛书在学术界已经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此外,中国藏学出版社等出版单位出版了一系列的藏学专著,为国内藏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不过,这些译著中,大多数是出版年代较近的著述。出版年代较为久远、常年尘封于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无人问津的所谓百年老书大多没有翻译出版。只有少部分在解放前曾有译文,比如英人查尔斯·贝尔的《西藏的人民》(The People of Tibet)早在 1929 年就有刘光炎 的译本(题为《西藏人民的生活》,上海民智书局出版),但用文言翻译,没有现代标点,而且错误极多^[2],已经不能满足今天的需要。对于未译的著述,我们必须组织力量翻译出来;对于已译有误的,必要时必须重译。

为什么我们对西方人关于西藏的百年老书如此“情有独钟”呢?原因很简单,我们需要了解过去的西藏,这对于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的历史与现状都极其有用。此外,如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中国文化,尤其是作为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文化。在民族文化这个百花园中,大概最为灿烂夺目的民族文化之一就是藏族文化了。出版界介绍和推出西藏图书的日渐增多,国人对藏族文化的关切之情也绝不亚于洋人。读者渴望了解神秘的雪域高原,这仅仅靠国人现在的著述和现有的译述是不够的,还需要译介更多的洋人关于西藏的著述,其中百年老书最为原始、极有价值而富有趣味但却翻译出版得较少,极难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历史的原因,过去因为国力之衰弱以及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能够有条件 and 机会进入西藏的人士寥寥无

几,旧中国连温饱都难以维持的普通人更是难以企及到雪域高原进行考察,因此国内对于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记述和研究与洋人比较而言就相对薄弱。而西方资本主义的“文明人”早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开始一次又一次以各种不同的身份和名誉叩动西藏的门扉……

这些对西藏予以“关注”的西方人中,有的是不远万里而来的传教士,有的是越过崇山峻岭、冒着生命危险而来的探险家、科学考察者,有的是扛着洋枪洋炮闯入西藏这块中国神圣的领土的。他们的目的各有不同,但动机大致相当。都想不同程度地使这块雪域圣地“西化”,都想在此经商渔利,然而,令他们惊奇的是,这里固有的宗教文化是那样的根深蒂固、那样的难以动摇。相反,许多人藏者被西藏文化所深深吸引而流连忘返。

他们中有许多人留下了有关西藏的非常精彩而弥足珍贵的原始记载,并早已在西方出版,引起了西方人的极大兴趣,而中国学人只在自己的某些论著中引用过这些东西而已,普通的读者就更是难以见到这些封存在国内极少数图书馆的角落里的精彩著述了。尽管这些出版物的作者们仅仅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观察、记录西藏,尽管他们的动机有的不太良好,但是从这些出版物中,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窥见当时西藏在某些方面的真实面貌,有些描写为我们了解和研究西藏提供了较为原始的素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可以“拿来”用的,只是我们应该采取一种客观的、批判的态度。比如,从探险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鲜为人知的民风民情、奇特壮观的自然风光;从狩猎者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所谓“文明人”当时屠杀野生动物的野蛮行径!从科学考察者在藏的记述中,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西藏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的生动描述,可以读到关于美丽可爱、令人流连忘返的动植物方面的描写;从政客或军人的著述中,我们可以认清帝国主义在藏经营的真实用心和丑恶目的,同时也可以从其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描述中看

到,因为藏族僧俗人士对中央政府的认可使他们在藏难以顺利达到目的,用他们的话来说,是“中国皇帝”成了他们在藏经营的绊脚石!从而可以从他们的口中证实一个铁的事实:西藏地方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为了给广大读者及藏学界提供更多有关西藏的百年老书的翻译作品,我们在有关出版社的支持下,决定陆续精选部分已经出版百年左右甚至更早的有关藏族地区的西方论著,翻译成中文编辑出版“洋人眼中的西藏”译丛,以为国人了解洋人们是如何踏上中国土地进行“考察”的,并从他们的著作中批判性地了解当时西藏及其周边地区的真实情况,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多侧面、多角度的丰富材料。相信本丛书的出版,无论是对普通读者了解西藏,对学者研究西藏都会有所裨益。

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西方人在描写西藏时是带有他们固有的偏见或者说是成见的,我们在翻译、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的过程中对有关问题必须去粗取精,作出一定的技术性处理。我们对这些著述中常见的问题及处理办法如下:

1. 有些作者错误地将西藏作为一个“国家”处理,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为了尊重历史,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根据上下文的不同情况,统统改译为“西藏地区”、“西藏”或“藏族地区”等,并在必要的地方加以说明。

2. 有些作者对西藏各方面的了解是一知半解的,犹如盲人摸象,这样的地方为了尊重原文的真实面貌,我们照译不误,但都要加上必要的“译者注”以资匡正。

3. 有些作者在描述西藏与祖国内地之间的往来和关系时,常常将中国政府与西藏政府相提并论,将中国与西藏相提并论,这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也是在蓄意歪曲历史事实。凡是这样的地方,我们都将“中国政府”改为“(中国)中央政府”,将“西藏政府”改为“西藏地方政府”,将“中国”改为“中国内地”等等。

4. 也有一些地方我们照译不误,目的在于真实地再现当时西方人对我国西藏怀有的不良用心,再现“文明人”的不文明行为:比如,对西藏及其周边地区(包括尼泊尔等国家)土著民众的歧视等。对于这样的地方希望读者批判性地去阅读和理解,切莫望文生义、误入歧途。

我们恳切地希望这套丛书能给广大读者带来阅读的快乐、为学术界同行提供一些有用的资料——哪怕就那么一点点,我们就感到欣慰和满足了。当然,译丛难免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点,希望得到各位的指正和批评。我们会逐步改进,虽然不可能成为最好,但通过大家的努力,相信今后一定会做得更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实际上这套译丛是我们已经推出的“雪域旧旅”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与四川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继续。因此,由王尧先生写的总序和我的主编前言几乎没有改动。“雪域旧旅”早该在两年前出版,由于选题的特殊和技术性的问题,以及某出版社的耽误,直至前不久才由上述两家出版社共同出版,这里谨向为译丛付出辛劳的译者以及编辑们表示感谢。为了今后技术上便于处理,我们还是决定将这套译丛交由我们长期打交道,有着深厚友谊的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了有所区别,我们将译丛更名为“洋人眼中的西藏”,希望广大读者和朋友们继续关心和爱护这套丛书。我们会努力做好。

清华大学文学院

王启龙

2002年1月11日

注 释

[1]冯友兰:《一件清华人当作的事情》,载《清华周刊》第32卷第2期,

1929 年,7-8 页。

〔2〕对此,李际亨氏曾经于 1932 年在《西北研究》第 3 期上撰“评刘译《西藏人民的生活》”一文予以批评指正。

德西迪利采用的参考书目

1. 致耶稣会会长的信函(手抄本), 标示为 1713 年 11 月 12 日和 11 月 15 日, 果阿; 1713 年 12 月 30 日, 苏拉特; 1721 年 9 月 21 日, 德里; 韦塞尔斯(274 页)所提及的那些在耶稣会的文献材料, 显然都还没有出版。

2. 致罗马皮科罗米尼(Francesco Piccolomini)神父的信函, 1714 年 8 月 21 日, 阿格拉, 由韦塞尔斯将其收入了他 1911 年出版的 *Atti e Memorie del Congresso di Geografi Orientalisti in Macerata* 一书, 30-39 页。这封信存放在兰开夏郡, 斯托尼赫斯特的耶稣会学院(G. Sandberg, *Exploration*, 注释 1, 52 页.)。

3. 在 *Sommario della Causa fra Gesuiti e Cappuccini circa priorità della Missione del Tibet* 中还有一些信件, 于 1728 年在罗马出版。其中有致格拉希(Ildebrando Grassi)神父的著名信函, 1715 年 4 月 10 日, 拉萨。霍尔德(Du Halde)将这封信翻译了出来, 1843 年在巴黎发表于 *Lettres Edifiantes*(《感化文学》)上, 卷 3151 页(韦塞尔斯, 274 页, *Lettres Edifiantes*, 里昂, 1819 年, 7 259 页)。

这是手抄本在皮斯托亚被发现之前, 我们对德西迪利的旅行情况所知道的唯一文件。

这份文件曾经使用多种文字出版: 阿斯特利(Astley)的《旅行文集》(*Collection of Voyages*)英文版, 1747 年, 卷 4; 马克汉姆爵士(Sir Clement Markham)在其《鬼怪和组成》(*Bogle and Manning*

附录,302页)一书中,将 *Lettres Edifiantes* 作为参考文献,卷 15,184 页。普雷沃斯特 (Prevost, 20 卷,巴黎,1746—1789 年的 *Histoire generale des Voyages*(《旅行简史》)原来就是根据阿斯特利的《旅行文集》收录的。普雷沃斯特在著作中也收录了这封信(卷 7,第 7 章)。这封信也就是从此书中抽出来译成德文,发表于 *Allgemeine Historie der Reisen*(21 卷,莱比锡 1747—1777 年)一书卷 7 中的。

德西迪利在本书第 3 册第 22 章提到了这封信,因此也纠正了他发现原来是错误的一个论断。

在苏马里奥(Sommario)的这本书中,另外还收了 4 封德西迪利的信函,其中的两封信函,一封是 1715 年 8 月 5 日从列城,一封是 1717 年 2 月 15 日从拉萨,分别寄给耶稣会会长的;另外两封则是 1718 年 3 月 12 日和 8 月 4 日从塔波(Takpo)寄给蒙太奇奥(Felice da Montecchio)神父的,这 4 封信都在普伊尼(Carlo Puini)出版时收入了附录,361—378 页。

4. 普伊尼(序言,42 页)又提到了 1717 年 2 月 13 日发自拉萨的一封信,这封信由扎卡里亚(Zaccaria)发表于 *Bibliotheca Pistoriensis*,185 页。

5. 《N. 德莱尔编:依波利多·德西迪利西藏日记》(*Notes sur le Tibet par le P. Hippolyte Desideri, Recueillies par N. Delisle*)(克拉普鲁斯发表于《亚洲学刊》*Journal Asiatique*, 2me Serie, 8, 1831 年,117 页)。德西迪利也提到了地理名词以及地理细节的几条注释。克拉普鲁斯(Klaproth)没有说明德莱尔(Delisle)是从什么地方收集它们的。

6. 1717 年 2 月 13 日致罗马教皇的报告,那是他到达西藏,首次在西藏逗留的时候。在罗马的传信部图书馆(普伊尼的 42 页提及)。

7. 1721 年 9 月 21 日从库提致教皇的短信(附录,382 页)。

德·古伯纳蒂斯(De Gubernatis)的 *Rivista Europea* 也做了收录, 1876 年 7 月, 293 页。

8. 短篇回忆录, 手抄本。虽然是匿名, 但是从总的情况来看, 可以肯定这个手抄本是德西迪利的。它的题目是 *Avvertimenti a' Missionari viaggiatori nel Tibet* (Biblioteca Vittorio Emanuele, Rome, Fondo Gesuitico, 手抄本, 1384 年, 注释 31), 1876 年, 德·古伯纳蒂斯在他的 *Rivista Europea* (卷 52, 第 7 章, 121 页) 一书中首次发表, 里面有很多遗漏和错误; 1928 年, 贝内德托(L. Foscolo Benedetto)在佛罗伦萨以小册子的形式, 再次发表了这个手抄本, 更正了其中的遗漏和错误之处, 在私人圈子里传看。伯希和(P. Pelliot)在 1925—1926 年的《通报》388 页, 也曾提到了这一点。

这仅仅是个概要, 简述了韦塞尔斯的手抄本 A 第 4 册末尾第 17 章、第 20 章的情况, 同时也简述了佛罗伦萨手稿中该报告的 f° 272—316(见序言)

报 告

正如序言中所说明的,这份报告现存有 3 部手抄本,3 部手抄本都是用意大利文所写,抄手各不相同。这 3 部手抄本,一部是普伊尼发现的,另外两部属于耶稣会的财产,由韦塞尔斯首次披露出来。

1. 1875 年,普伊尼在皮斯托亚的一家私人收藏中发现了一部手抄本,从此以后,这部手抄本即交由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收藏。1904 年,普伊尼出版了手抄本的绝大部分,并在序言中描述了该手抄本的情况,标题是:Breve e succinto Ragguaglio del Viaggio alle Indie Orientali del Padre Ippolito Desideri della Compagnia di Gesu。这个标题很可能仅仅和开头的几张纸有关系,也就是总结了东方之行的情况。这是一部 4 卷的手抄本,317 张,633 页,连续写下,没有做任何分章分段,唯有手抄本的最后部分稍微不同,描写了归途的情况,突然又出现了章节,标示为 XIII, XIV 和 XV。

根据普伊尼的辨认,这个手抄本有三种不同的笔迹。有许多地方作了记号,说明这个文本是口授的,至少有部分是这样(比如 f°39 v. “10 月里,事实上是 3 月……”)。日期也有一些矛盾之处,特别是开始所概述的旅行情况和此书结束时重复概述的旅行情况,多有不一;比如在《序言》中说到离开列城的时间是 8 月 27 日,而结尾说的是 8 月 17 日和 8 月 26 日。到达扎什岗(Tashigang)的时间分别为 9 月 7 日和 9 月 27 日等等。

1876 年 6 月,普伊尼教授在佛罗伦萨的 Bollettino Italiano di

Studi Orientali 上, 33—42 页, 公布了他的发现; 在《地理杂志》(马克汉姆主编, 1873—1878 年) 卷 3, 1876 年, 21 页和 253 页上也做了通告。在手抄本发现及其出版的一段时间里, 这个手抄本在归属上有很多变化, 它甚至还几乎归哈克鲁伊特(Hakluyt)协会所有。普伊尼对这个手抄本在各种出版物中所发表的内容也作了介绍:

Il P. Ippolito Desideri ei suoi Viaggi, etc., Florence, 1899.

Viaggio nel Tibet del P. Ippolito Desideri. Rivista Geografica Italiana, Florence, vol. Vii, December, 1900, p. 565.

Il p. Ippolito Desideri e i suoi Viaggi in India e nel Tibet (1712—27); and Il Buddismo nel Tibet secondo la Relazione del P. I. Desideri, in Studi Italiani di Filologia Indo-Iranica, edited by Pulle, Florence, 1899. Vol. Iii, pp. I—xxxiii, and 1—63, 113—52, ill.

德西迪利在 Giro del Mondo Bologna, 1900, No. IX 上所概述的旅行情况。

另外还有其他一些文章。

1904 年 11 月, 奥尔登伯格(Serge Oldenburg)教授在 Journal of the Russian 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 上, 发表了论述近期西藏文献的文章。奥尔登伯格提到了德西迪利报告的 3 部手抄本, 一部在哈克鲁伊特协会, 一部在佛罗伦萨的玛格利亚贝加纳图书馆, 一部在意大利国家图书馆。它们显然是指同一份手抄本, 亦即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的那份手抄本。

2. 韦塞尔斯的手抄本 A。

这是 430 页的一卷本, 10 1/4 × 12 英寸, 字体优美, 有一个序言, 全书分为 3 册, 然后又分为很多章, 有目录。这个一卷本的结束有祷文: “Laus Deo, Beatissimae Virgini Mariae ac Sto Francisco Xaverio, Indiarum Apostolo. Die 22 Junij, 1728 年。”